

# 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

錢乘旦

---

[提 要] 本文就“澳門學”問題說幾點看法,以參與關於“澳門學”的討論。本文主要觀點是:1) 澳門可以成為一門“學”,理由是澳門有其特殊之處,有成為“學”的社會文化基礎;澳門之特殊並非如每個城市那樣各有其特殊性,而是足以讓它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。2) 澳門學的學科邊界是跨學科的,應該參與和可以參與的學科很多,只有做跨學科的研究,澳門學才能充分展現其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。3) 建設澳門學,首先要做好人才建設,其一是把現有的力量組織起來,其二是培養新生力量、形成梯隊——尤以後者更重要。4) 開展澳門研究,需要重視澳門視角,站在澳門看澳門,才能表現一個更加真實的澳門,為國家和澳門的發展提供諮詢。

[關鍵詞] 澳門學 學科體系 學科建設

[中圖分類號] D676.59 [文獻標識碼] A [文章編號] 0874-1824(2020)04-0025-07

---

一段時間以來,關於“澳門學”的討論一直在進行,尤其在澳門本地以及華南地區,學者們就澳門能不能成為一個“學”,如果能、如何界定及研究這個“學”等諸多問題,發表了各種見解。這些討論雖不能說如火如荼,但始終在持續,並且引起一定的關注。贊成者主張澳門應該成為一個“學”,確實值得下工夫研究;反對者認為澳門這個地方太小,怎麼也成不了一個“學”。贊成與反對各執一詞,使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化,而“澳門學”也基本上處於討論的階段。應學界朋友的邀請,我對此問題談一些看法,算是介入這個討論,起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。

## 一、澳門之所以成為“學”

首先來談談“學”。在中國人的腦子裡,“學”是一個很高尚的東西,比如“儒學”、“佛學”、“西學”、“中學”等;其高大如此,正如“家”在中國人腦子裡無比高大,如“科學家”、“文學家”、“哲學家”、“思想家”之類。不過這是由語言造成的思維模式,在西文中,這種模式是不存在的,比如英文中對應各種“學”的詞匯:Confucianism、Buddhism、Western Learning、Chinese Learning,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境;對應各種“家”的詞匯:scientists、writers、philosophers、thinkers等,直接翻譯過來,只是“做科學的人”、“寫文章的人”、“搞哲學的人”、“思考的人”而已。單獨一個“學”在西文裡也沒有那麼神秘、高不可攀;“學”就是 learning 或者 study,直譯就是“學習”和“研究”。

因此,如果真有“澳門學”存在,那只是“關於澳門的學習”或“關於澳門的研究”。澳門是不是

需要學習、需要研究呢？當然是需要的，答案是肯定的。

但如此一說並沒有解決問題，因為“學習”和“研究”是普天下之事，比如上海是不是要學習、北京是不是要研究？如果要，那就有“上海學”、“北京學”、“安徽學”、“廣東學”等等，甚至“番禺學”、“金灣學”之類。近若干年來確實有將“學”擴大的趨勢，許多地方都想建立自己的“學”；正因為如此，反對“澳門學”便更有理由了：不能為任何地方都立一個“學”。

澳門之可以成為“學”，是因為它之與眾不同。迄今為止，所有被立為“學”的地方，都有其特殊之處，正因為它們特殊，才讓人感到有特別的興趣，因而需要做特殊的研究，由此慢慢凝聚視角，終究成為“學”，如“敦煌學”、“徽學”、“吐魯番學”之類。然而僅有特殊尚不足以構成“學”，必須是非常特殊，其特殊是其他地方極少甚至完全沒有的，而這些特點確實蘊藏着深刻的內涵，很值得發掘。那麼澳門這個彈丸之地，是否具備這樣的特殊性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首先，澳門的歷史很特殊。葡萄牙人進住之前，這裡只是荒野之地，與粵東南多數沿海地區一樣，並不甚值得人們關注。葡人進入澳門，除了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意義，即西方殖民者在中國佔據了第一塊飛地之外，它還具有世界意義，即它把葡萄牙人開闢的海上貿易大通道，和自古就有的東亞陸路商業網絡連接起來了，中國內陸的商品通過澳門落入葡萄牙人之手，由他們送往歐洲市場。這些商品到達歐洲後，又對歐洲產生影響，推動了歐洲的社會經濟轉型——這些就是大航海時期澳門的世界歷史意義。因此，這段歷史是如何發生、如何發展的，機制如何、運作如何等等，就很值得做學術研究。大航海是國際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熱門領域之一，但澳門的作用和地位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未受足夠的重視，這和中國學術界長期未介入甚至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有關。在澳門研究中，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內容，在“全球史”盛行的今天，人們應該認識到澳門的歷史是世界的歷史，它是與世界的近代轉型連接在一起的。

葡萄牙佔據澳門四百多年，但澳門卻很難用“殖民地”一詞來定位。在葡人佔據的大部分時間裡，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行使主權，葡人則僅擁有治權，這種情形在一般殖民地是不大看見的。那麼這種“共治”形態是怎麼運作的，如何能夠存在，機制又如何？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。在世界殖民歷史中，這個現象很特別，可以做深入研究，牽涉到世界殖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實踐。人們可以探討這些問題：比如當時的葡萄牙人如何看待澳門，他們對澳門的期待與定位是什麼；中國政府又如何看待葡人的進住，它如何理解葡人管制以及為什麼允許葡人存在等等。

其次，澳門的文化很特殊，既非香港那種強勢殖民文化侵襲，又非完全的傳統文化延續，它體現了中西文化的有機融合，在人們的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中既保留濃厚的中華文明特徵，又帶有明顯的外來文明因素。在澳門，不同文明間沒有出現過嚴重對抗的情況，相反是一種共存共在。中西文明共存現象在澳門十分明顯，這是在多數殖民地很難看到的。關於這個現象，學者們早就有所發現並做了一定的研究，但多數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尚未進行理論梳理。為什麼在澳門出現這個現象，而在離它一岸之隔的香港則是完全的殖民化？這個問題，對全球的殖民理論研究以及對中國當下的現實需要，都具有重要意義。

從文化學角度看，不同文化在什麼情況下對抗、在什麼情況下融合、在什麼情況下彼此隔離井水不犯河水，等等，其實是很有意思的話題，對此，澳門提供了很好的案例。在澳門生活的人，都能感覺到文化共存現象的存在；澳門回歸後，這種現象不僅沒有消失，反而更加彰顯。澳門的文化環境是包容的，現在的澳門允許多種文化存在，因此人們在澳門生活，彼此相融，和睦相處，對不同文化全然沒有另眼相待、異樣視之的感覺，所以澳門顯得平和、中道——那麼，是什麼在起作用、如何

起作用呢？這又是個深刻的問題。

第三，澳門人的認同選擇很值得注意，這是個大眾心理問題。澳門是西方殖民擴張過程中最早落入西方人之手的非西方地區之一，到回歸祖國時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。但澳門人從來沒有在認同方面和內地脫離過，澳門人從來沒有認為他們不是中國人；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澳門和內地長期隔離，澳門人仍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。這和英國統治僅一百多年的香港成鮮明的對比。那麼，是什麼因素造成這個區別——是統治方式、文化政策、生活習慣、心理傳承，還是其他？

第四，回歸後的澳門和回歸後的香港有很大不同，澳門的經濟一直很好，但澳門的經濟結構卻是畸形的，博彩業又經常被看作是異類產業；香港的經濟從來都是高大上的，其國際聲譽眾所皆知，但香港屢遭經濟危機打擊，香港的民生幸福感遠低於澳門。這是為什麼呢？什麼因素在起作用？是制度嗎？是政策嗎？是外部因素在起作用，還是人們對幸福的期待不同、價值理念不同？一國兩制執行到現在，港澳差異日益凸顯，細細研究澳門，就顯得很有必要了。“一國兩制”並非只是中國有之，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、英國的蘇格蘭等等也都可算是某種意義上的“一國兩制”；美國各州都有州權，可以制定不同的地方法律，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可以說是“一國多制”。但“兩制”在有些地方執行得好，在有些地方執行得不好，為什麼呢？澳門是一個切入點。

以上所舉例子，說明澳門可以成為“學”，因為澳門確實特別，而且特別得很有深度，值得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。說實話，我在最初接觸到“澳門學”之說時並不以為然；但對澳門有更多的了解之後，態度逐步起變化。我相信多數反對將澳門立為“學”的人，是對澳門沒有或缺少親身體驗。因此，如果想要更多的人接受“澳門學”，就應想辦法讓更多的人知道澳門、給他們親身體驗。

## 二、澳門學的學科邊界

一門“學”有自己的邊界，沒有邊界，“學”也不能成立。比如“敦煌學”，我們都知道它的邊界在哪裡，敦煌學的對象不是敦煌這個地方，而是與保存在敦煌的文化遺存相關的一切。像“徽學”、“吐魯番學”，這些“學”其情況也差不多，它們的對象也是歷史文化遺存，以檔案研究為主。

澳門學有所不同，它與“歐洲學”、“美國研究”(American Studies, 實際上就是“美國學”)類似，是把一個地區的總體現象作為考察對象，其邊界範圍就比較大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。與“歐洲學”、“美國學”一樣，澳門如果成為“學”，它的研究對象就不僅僅是歷史文獻，也是和澳門這個地方相關的各個方面，既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、宗教、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策及其實施狀況，也包括政府管治體系和運行機制，經濟產業結構和運營方式，民眾心理和生存狀態等等，還有民俗民風、大眾信仰、文化特徵、休閒娛樂等各方面。總之，澳門學是跨學科的，它的邊界是“與澳門相關”。但與澳門相關又不意味着局限於澳門這個地方，澳門是一個國際概念，如前所述，它從四百多年前大航海時期起就是一個國際城市，儘管小，卻與世界整體發展始終連接，見證並參與了一個又一個歷史時代。當代澳門更以其特殊地位(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)而存在於世，與此相關的種種現象，都處在澳門學的邊界範圍內，所以澳門學不僅是地方性的，也是世界性的。

這樣，澳門學的邊界特徵，第一是跨學科的，第二是跨地區的。

就當代學術而言，跨學科已成一種趨勢，不僅理科如此，文科也如此。學科交叉和學科互補是推動研究創新的真正動力，十八、十九世紀盛行的學科分割狀態，已經在阻礙學科發展了。澳門學立“學”之時就應該明白這一點，它不能用某一個學科的邊界限制自己，而應該用一個“全科”的面貌彰顯自己。這不意味着每一個學者的研究都是五味雜陳、橫穿界限的，而是說，澳門學具有“全

科”的包容性。即便如此,就每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而言,我們也提倡跨學科,只有跨學科才有新創造。但不排斥學者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進行研究,我們希望看到每一個學科都出現根基深厚的學術成果,看到在“澳門學”的概念下,多個學科(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、法學、文化學、民俗學、教育學、宗教學……)的共同參與和貢獻。

同時,作為跨地區的研究,澳門學具有中國性和世界性雙重性質。中國性是指澳門的現象(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)都與中國相關,無法把澳門問題和中國問題分開;世界性是說澳門與世界直接相連,由於它特殊的地位,它與世界的聯繫不等於中國與世界的聯繫,不同於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或城市與世界的聯繫。從這個角度看澳門,它的邊界絕非是“彈丸小地”;從這個角度研究澳門,它的外延是很開闊的。

目前學界對澳門的研究,一方面是分散,未有整合之勢;二方面是參與的學科有限,大致集中在幾個學科,如歷史、法律、微觀經濟等,尤以歷史突出。其他學科很少意識到自己在澳門研究中也有用武之地,研究澳門大有可為。例如教育學,不久前看到電視中有一檔節目比較香港與澳門的通識教育,發現香港的通識教育成了反國家言論的傳布場;澳門恰恰相反,通識教育是培養國民意識的孵化器。那麼,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?教育學研究是責無旁貸的。再如文化人類學,這是一個特別“高大上”、特別“小眾”的學科,不會把澳門納入其眼中。然而澳門恰恰是一個文化人類學絕好的田野考察點,多種社會群體、多樣種族社團組成的“澳門人”為文化人類學提供了難得的考察對象。類似的,比如社會學、心理學等等,迄今都未涉足澳門研究,一方面因為它們尚未意識到澳門的價值;另一方面因為關於澳門價值的宣傳實在太少,因此在很多人腦子裡,澳門只是一個賭場。

其實並非如此,以宗教學為例。澳門有中國最早的羅馬天主教堂和修道院,早期天主教傳教士都是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。時至今日,修道院裡仍然保留着許多珍貴的文獻,可惜研究工作卻幾乎不存在(原因之一是中國學者懂葡語的不多,葡國學者不太感興趣)。基督新教在澳門也有傳統,新教主要派別都有其長期存在,迄至今日仍有不少信徒。然而對多數澳門居民而言,西方宗教仍然是一個陌生的符號,與中國華南地區其他地方一樣,民間信仰始終是主要的信仰體系;當然,人們信還是不信,卻不是一件容易說清的事。不過在澳門隨處可見各種供奉場所,我們都知道西文的MACAO一詞,就源於媽祖信仰的“媽閣廟”。除此之外,道教、佛教也有較大的影響力,人們對這些宗教的了解程度和認可程度,明顯高於西來宗教。這些現象就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:作為世界上最早受到西方管治的地方之一,後來又經歷一波又一波強勢的傳教浪潮衝擊,當地居民卻很少受到衝擊的影響,其精神生活仍與澳門周邊中國管轄區基本無異,其原因何在?這就有賴於宗教學和社會學的解釋了。總之,在澳門學範疇內,各學科都有用武之地,都有許多問題在等待他們去解決。澳門學的邊界確實很大,需要跨學科的合作努力。

### 三、澳門學的人才建設

要為澳門立“學”,首要任務是將它立起來,讓大家看見它的存在。而做到這一點,不是靠努力申述這個“學”的必要性,也不是靠不斷討論這個“學”的定義或邊界在哪裡。與其務虛,不如務實;與其空論存在不存在,不如着手組織隊伍,整合力量,實實在在推進關於澳門的研究工作。

前文已提到,澳門研究一直存在,只是力量分散,目標凌亂,成果不集中,聲勢不浩大。學者若從事澳門研究,多半是出於自身興趣,不具備學科意識,完全缺乏組織力量,因此無法進行集體攻關。所以,如果要建立“澳門學”,首先需要組織起來。組織包括兩個方面,一是學者自己的行動,

組建學術團體,可以考慮組建全國性的澳門研究會,作為第一步,可以先在澳門建立其核心機構,再逐步吸納國內其他學者,按學術團體的規範進行活動,比如舉辦學術年會,開展協同項目等等。二是取得政府的支持,第一取得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持,將澳門研究作為特區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特色組成部分;說實話,特區政府不出面支持澳門學,誰比它更具備這樣的資格呢?澳門特區政府對文化教育事業一向十分重視,每年都向這些方面投入巨款,澳門學作為提升澳門學術的抓手和整合的渠道,從政府方面得到資金和行政支援,應該不成問題。況且,澳門本來就有推動、發展文化事業的政府部門澳門基金會,政府在澳門學建設中發揮作用是具備條件的。第二爭取中央部門的支持與肯定,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,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,中央對澳門會更加重視。

其次要形成學術梯隊,尤其要形成澳門自己的學術梯隊。這裡面包含兩層意思,第一,由於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,澳門研究作為一個領域,其學術力量在全國範圍內都相當不足,與其他學術領域相比顯得尤為薄弱,這種薄弱同時也就成了澳門不能成為“學”的一個重要原因;所以,要推動澳門成為“學”,就需要組建學術力量,將各學科的學者們推送到澳門研究中來,形成學術梯隊。第二,同樣由於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,澳門這個地方的學術研究底子薄、積累少、人手不足,因此當前研究澳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外部力量的幫助,也就是說,借用澳門以外的學者進行研究。這樣做沒有什麼不好,也很有必要,但是把外部力量轉化成自身力量卻又是必須的,為此就需要做一些非常具體的工作,制定一些非常具體的政策,從而把外部力量制度性地納入到澳門學的學術梯隊中來。在這裡,政府的主導作用又非常重要。近年來,內地許多地方爆發“人才大戰”,出台了種種優惠政策;澳門在這方面顯然有更大的作為空間,若想把澳門立為“學”,需要以人才建設為引領。

從長遠來說,培養人才是“百年大計”;澳門學的人才培養,澳門自然責無旁貸,應該承擔最大的義務。現在,無論是澳門大學、澳門科技大學、澳門城市大學還是澳門理工學院,都有研究生學位項目,但都沒有澳門研究學位方向,也就是說,都沒有澳門學的指引導向。這反映了在教育管理層面上,“澳門學”這個問題不在其工作日程中,也未有納入的意識。因此,可以建議各校有意識地引導對澳門問題的研究,使研究具有更強烈的現實參與和實用感。應該鼓勵各學科的研究生培養項目都向澳門研究方面傾斜,可考慮由政府或學校設立專門的澳門研究獎學金,鼓勵參與澳門研究,資助研究項目。研究生論文可以更多地以澳門問題為選題,例如,經濟學方面,與其泛泛而談討論一些經濟理論,不如實實在在考察某個澳門經濟現象,這樣的論文不僅應該得到鼓勵,而且可以得到獎勵。如果各學科在研究生培養導向上都注意澳門研究,澳門學的人才建設必定得到很大的推進。人才培養不是一兩年就能見效的,而是需要十年八年的周期,因此,培養澳門學的學術梯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,這樣的長遠工作應納入澳門特區政府的文化和教育發展規劃中去,用這種方法培養澳門的澳門學人才。在這方面,所有學科都可以出力、也都應當出力,並且因此而受益。比如說,澳門的法律有其特殊性,澳門培養法學人才,就應當更多地為澳門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實踐服務,其畢業論文也就自然為“澳門學”增添了光彩。如此培養的澳門學人才,因此而具備社會意義。

引進也是人才工程的重要方面,現時內地各省市都在這方面下足工夫,出台很多政策。如果不把澳門學僅僅理解為純粹的經院研究,而是既有學術意義又有現實適用性的研究平台,那麼以引進作為廣羅各學科人才的方便渠道,應該是澳門學人才建設的另一個側面。如果把這項工作作為政府工程來進行,其效果會特別明顯。澳門現有幾所高校都來做這件事,在不同學科從事澳門學的人才建設,一定能取得顯著成效。當然,政府的主導,尤其是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,是其關鍵因素。

#### 四、澳門學的研究視角

一切研究都有視角，從不同視角進行研究，會產生不同的效果。澳門學的視角在哪裡？從澳門成為被研究的對象開始，一直存在三個視角，一是中國視角，二是葡萄牙視角，三是澳門視角。在這三個視角中，中國視角和葡萄牙視角一向是主要的，迄今為止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這兩個視角上。葡萄牙的澳門研究起步比較早，因為葡萄牙佔據澳門幾個世紀，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帝國在東方的重要據點，一向受到葡萄牙人的高度重視，他們關心澳門、寫關於澳門的書、討論澳門的問題，應該在其情理之中。但葡萄牙人說澳門，是把澳門作為葡萄牙帝國的一個海外行省來看待的，他們的視角是葡萄牙視角，站在葡萄牙看澳門，那只是一塊殖民地，如果需要對那個地方做某種程度的“研究”或討論，那只是為了了解那個地方，以便更好地統治那個地方。葡萄牙人寫澳門、說澳門，更多是寫他們自己在那裡的活動及統治情況，說澳門在葡萄牙東方殖民地的作用或地位。他們對澳門本身並不關心，對澳門本土沒有很大興趣。他們寫出來的澳門，是葡萄牙人的澳門。

與葡萄牙視角完全不同，中國視角下的澳門是中國的一塊土地，廣東沿海的一個小半島。關於澳門的記載，在中國史書裡只是地方志中的一個小節，關於澳門的敘述，也是放在地方志中來講述的，在中國視角下，澳門是一個偏僻之處，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。如果說人們關注北京、上海這些地方，那是因為這些地方太重要；而澳門幾乎是一個被忘卻的地方，當人們對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尚且目不暇給的時候，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幾乎很少有學者願意光顧。所以在中國視角下，澳門研究是很缺乏的。

改革開放後情況發生很大的改變，其一是因為學術繁榮發展，澳門落入國內學者的眼中；但更重要的是澳門回歸迫在眉睫，澳門研究也就提上了日程。儘管如此，內地學者觀察澳門仍是把澳門放在中國這個大背景下來討論的，況且內地學者缺乏在澳門生活的經歷，不容易弄明白澳門的社會和澳門的人，也不容易講清楚澳門的經濟和政治管治。對澳門的敘述經常會放在一個更大的敘述（也就是中國敘述）中來進行，因此是一個更大研究計劃中的一個章節。

如此，就需要一個澳門的視角來研究澳門了，也就是站在澳門看澳門。站在澳門看澳門必須要有人在澳門長期生活的經歷，這樣才能看懂澳門，用切身的體會理解澳門。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澳門設定為研究對象的主人翁，而不像葡萄牙視角或中國視角那樣，澳門只是一個配角。舉一個例子，關於澳門的文化特徵：從中國視角看問題，澳門展現的是中國文化特徵；從葡萄牙視角看問題，澳門有葡萄牙的文化歸屬；可是從澳門視角來看這個問題，澳門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場所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這裡非常融洽地匯合，它展現的既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中國文化，又不像香港那樣滲透着殖民地文化屬性。而這樣一種文化特徵，確實只有長期生活在澳門、對澳門有着深刻理解的當地學者才能體會到並且概括出來；而確實，這個特點是由當地學者提出來的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澳門博彩業：博彩業是澳門經濟唯一的支柱產業，它在 GDP 中的總量比值、其從業人員對澳門就業的重要性、其繁榮於澳門其他經濟部門與民生的巨大意義……所有這些，都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如此一種經濟結構經常遭到外界批評，而澳門人也許有他們的想法；那麼，如何判斷這個問題，確實離不開從澳門視角進行的研究。

“一國兩制”是一個嚴肅的課題。澳門回歸 20 年了，如何判斷這 20 年的成功與欠缺？需要做認真的、負責任的、一絲不苟的學術研究。在這個研究中，澳門視角不可或缺，只有把澳門的立場、澳門人的想法真正弄透了，才能做出最客觀、最符合事實的判斷，才能為今後的發展提供方案。有

許多工作需要、也期待學者們去做，比如：關於“一國兩制”的制度設計與實施，官員們怎麼想、老百姓怎麼想、大企業怎麼想、小生意人怎麼想、年輕人怎麼想、老年人怎麼想，等等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，需要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心理學、經濟學、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專家通力協作，共同努力，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調查，才能說明白。如此做研究要比空喊“完全擁護、堅決執行”更實在、更有用、更能夠為各級政府認定事實、制定政策提供依據，因此才能更加說明建設澳門學的必要性。但是，從事澳門研究的各學科專家——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心理學、經濟學、文化人類學等等的專家在哪裡呢？就目前而言幾乎沒有、至少非常欠缺，這樣就凸顯了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建設的重要性。澳門學不僅具備學術性，而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，需要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。

研究澳門，除了以上那三個視角，還有一個視角卻是人們經常忘記、又是澳門學所特有的，那就是全球視角。澳門雖小，其全球色彩卻很突出，澳門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國際作用，現在仍然繼續發揮；而這種國際性作用是多數內地城市所不具備的。大航海時期葡人西來，佔據了澳門，把澳門作為東西方海上交通貿易的重要樞紐，溝通了全球海上貿易體系與中華帝國內陸貿易體系的對接渠道，把東亞內陸商業拉進了西歐剛開闢出來的重商主義世界貿易，在資本主義的這個階段，澳門就發揮過重要作用。以後，澳門一直和世界事務密切相連，比如澳門是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最早中轉站；英國佔據香港後澳門是居港歐洲人的後方休整站；20世紀澳門是世界各種勢力窺探中國的橋頭堡和角鬥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新中國成立後尤其如此。澳門這些特殊的經歷和獨特的地位，使澳門研究必須注意其全球視角，而這個視角迄今為止卻很少有人意識到——無論從中國視角研究澳門、還是從葡萄牙視角/西方視角研究澳門，都難以認識到這一點。但作為對澳門進行全面研究的澳門學，卻需要樹立這個視角。

最後說一說澳門學的學術刊物問題，有呼聲說需要辦一個專門的刊物，為澳門學研究開闢園地。我覺得辦一個這樣的刊物也未嘗不可，也許最終確實需要這樣一個刊物，以匯聚學術力量。不過在現時，辦刊物並非是第一要務，未見得現在就要着手創辦。我相信經費問題並不難，難的是稿源，一份刊物如果稿源不足，就很難維持下去。現在，澳門已經有好幾份刊物可以刊登澳門研究方面的文章，比如《南國學術》、《澳門理工學報》、《澳門研究》等等，其中有幾份刊物其實已經很專業化，是專為澳門研究設定的。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刊物，而是文章從哪裡來？目前的現狀是好文章很少，高質量的學術文章更少。其中的原因十分清楚，大家都看得很明白：其一是澳門研究尚未成為學術的關注點，所以需要建立“澳門學”；其二是學術梯隊尚未形成，因此要進行學科建設。這些問題其實是一環套一環的：因為沒有澳門學，所以人們不關心；因為人們不關心，所以作者少、成果少；因為作者少、成果少，所以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就很困難。走出困境的路徑在於提倡和推動澳門本地的澳門研究，發動現有各大學各個相關學科都投入到澳門研究中來，共同建設澳門學。我們既要發動和依靠現有的作者群，給他們項目、向他們約稿；更需要有意識地培育出能夠做出優秀成果的研究生，尤其是博士生，動員學生研究與澳門相關的課題，只有這樣才能把澳門研究擴充到各學科領域去，擴大研究面，擴充稿源，由此才能創造出有質量的學術出版物。當然，學術出版和學科建設又是相輔相成的：出版暢通推動學科建設，學科建設又為出版提供保障。

---

作者簡介：錢乘旦，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。北京 100871

[責任編輯 劉澤生]